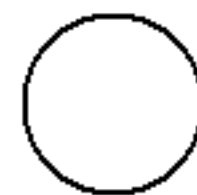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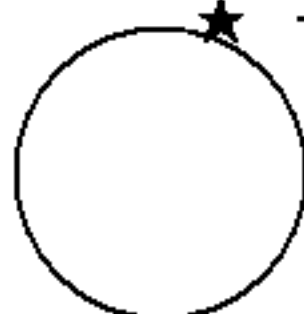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六期 ★



目 录

尼赫鲁标榜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貨色?本刊評論員 (1)

关于资产阶級国有化有 林 (10)

高尔基的革命傳統和战斗精神以 群 (20)

我国社会主义統一的国内市場管大同 (28)

一个很好的革命傳統陈展超 (36)

正确地对待考据楊永志 (39)

☆ 四月一日出版 ☆



尼赫鲁标榜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

本刊评论员

一九五五年一月，印度国大党在阿瓦迪召开的第六十届年会通过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目标的决议，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式样社会”的口号。自那时以后，国大党装模作样地在国内开展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运动”，加强了宣传。印度国内某些修正主义者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也大卖气力，为尼赫鲁的行径吹捧，说什么尼赫鲁确在奉行社会主义政策，印度已经在实现着“社会主义”，等等。

凡是看到印度的现实并承认事实的人，当然都能知道尼赫鲁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形式之一。作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政治工具的国大党，把社会主义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他们屁股后面的“印章”却告诉人们，这完全是为了适应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统治的需要。尽管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式样社会”的解释尽量闪烁其词，故弄玄虚，但这种宣传很快就露出了马脚。连尼赫鲁的忠实信徒、印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赫·德·马拉维娅，在他一九五八年所写的《喀拉拉邦》一书中也曾天真地抱怨

说：所有解释“社会主义式样社会”的“大作中竟没有一处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含义包括人剥削人的现象的终止”。“他们的企图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迥然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东西提出来，……在他们的手中，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用来同共产党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罢了。”^①

所谓“计划化”方法

究竟什么是尼赫鲁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真实内容呢？为了弄清楚这一点，需要从考察印度实施的所谓“经济计划化”着手。

尼赫鲁一九五八年在国大党《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基本看法》一文（这是一篇写给国大党领导人看的、用来统一观点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表示这样一种基本看法：“社会主义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他在那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实行某种“计划化”，就是企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用“计划化”的方法来“减少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病”。实际上，尼赫鲁在更早一些时候，例如他在一九四四

^① 《喀拉拉邦》，印度新德里人民出版社1958年英文版。



年所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宣传过这种观点。印度宣布独立后，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政权就已经按照尼赫鲁的这种观点着手实施所谓“经济建设计划”。到目前为止，已进入所谓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真正的计划化经济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绝不可能实现经济计划化。这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是近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修正主义者，却不断宣称国民经济计划化的方法已经日益为资本主义制度所接受，并且成为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条件。他们并且用印度实施“经济建设计划”这类事来宣扬印度“正在实现着社会主义的目标”。事情的真相是不是这样呢？印度的所谓“经济计划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印度各界人士对于国大党政府所采取的“计划”措施及其后果曾不断地有所评论，这些评论及其所透露的经济事实，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这些问题。

在国大党阿瓦迪年会和印度联邦议会正式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式样社会”以后不久，《印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曾说：“国内普遍地存在着一种看法，这就是，除了中央政府中的少数领袖以外，其余的人对于计划或计划的目标都没有什么同情，而把两者都看作是‘尼赫鲁的标新立异的想法’”。这篇评论又说：“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仅是一般民

众，甚至连执政党的二、三流领袖都不知道计划是怎么一回事”^①。

印度尼赫鲁政府的所谓“经济建设计划”包括两个部分，即属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专政国家的“国营”部分和属于私人垄断资本的私营部分。“国营”部分由政府投资，私营部分主要由印度大垄断集团和外国资本控制的私营企业投资，政府加以资助。在一个由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掌权的国家里，像这样的“经济建设计划”，当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协调”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计划”。我们说“协调”发展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说的，就是尼赫鲁政府苦心培植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为私人垄断资本和少数官僚特权阶层服务的。

根据尼赫鲁政府公布的数字，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两个所谓“五年计划”期内，在印度国民经济的投资总额中，“国营”部分略超过私营部分。“国营”部分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电力和农田水利等几个方面，并兴办了一些炼钢厂、机器厂等。这些实际上是为了替私人垄断企业的发展提供条件，为这些企业提供机器装备、原料和半成品等。印度的所谓国营企业，早在宣布独立以前的殖民政府时代就存在了。一九四五年四月，英国殖民政府曾公布一项关于工业的声明。这个声明说：“除了军需工厂、公共事业和铁路以外，具有全国重要性的基本工业，如果没有足够的私人资本来投资的话，也可能国营”。尼赫鲁政府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

^① 见《印度时报》1958年7月10日“国内一周”。



的这种做法。在印度宣布独立的初期，国内私人垄断集团虽已形成，但在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上仍面临着资金、技术、装备、工业原料等方面的困难，私人资本，特别是垄断集团，仍然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大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机器，以便通过它，筹措大量资金，进口机器、装备、工业原料等，来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条件。关于这一点，甘·达·比尔拉垄断集团的《印度斯坦时报》曾经说得很清楚：“国家所建立的三个炼钢厂共需六十亿卢比，但在目前印度资本市场情况下，私人资本要筹集一亿卢比来建立一个企业都很困难”。它又说：国家举办三个钢厂，其大部分产品将由私营企业加工，这将为它们“提供本世纪初纺织业景气以来最大的工业机会”。印度财政部长德赛也说：“在过去四——五年中，私营扩大了四——五倍，如果没有公营，私营就不能获得这个成就，因为谁会给它们必要的钢铁和机器呢？”^①甚至连印度大资本家甘·达·比尔拉本人也这样说：“那些认为公营部分妨碍私营部分发展的人是目光短浅的。公营部分即使在目前也已经给予私营部分很大的推动。公营部分将成为私人企业的动力。”^②这里我们附带提一下：这个比尔拉确是颇有“远见”的，在印度大资产阶级中，他是较早资助国大党、参加“国大党运动”的一个人，他很快认识到“国大党运动不是群众运动，如果国大党执政，实际权力将掌握在资本家集团手中”^③。后来事实也证明果然如此。

到一九六一年三月底止，尼赫鲁政府宣告“完成”了两个所谓“五年计划”。执行这些“计划”究竟对谁有利呢？印度许多资产阶级

报纸和国会议员指出，“计划”执行以来，印度广大的工人、农民以及中下层人民的处境更困难了，贫富悬殊更加扩大了，“穷的更穷，富的更富”了。

据印度中央统计组织所作的一项调查，在一九五——五二年度，在印度人口中，年收入在二百卢比以下的（即在最低收入水平之下，陷于饥饿状态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一九五六——五七年度，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二。最近，据印度计划委员会在一篇社会分析的文章中透露，印度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收入落入只占人口十分之一的人的手中；另一方面，有百分之十的人的收入不到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五。T. T. 萨姆尤尔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经济评论》上算了如下的一笔账：“百分之二十的富有者所得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波多黎各为五十六，印度为五十五，英国为四十五，美国为四十四。”这就是说，印度少数富有者攫取国民收入的份额，比英国和美国还高。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印度国会联邦院辩论预算拨款时，各反对党议员纷纷批评政府的经济政策损害了中小企业的利益而加强了很少几家大垄断集团的地位。人民社会党议员古鲁巴达斯华米揭露说，印度每个月有近一百家小公司倒闭，然后为一些大财团所收买。仅仅八家大财团今天控制了印度全部公开性公司实收资本的百分之六十七，它们总共控制了八十五亿卢比，其中两

① 见1960年5月18日印度《政治家报》。

② 见比尔拉1959年4月2日在印度加尔各答联合商业银行股东大会上的讲话。

③ 见德巴约蒂·柏尔曼《比尔拉家族的秘密》一书。



家控制了五十亿卢比。他在举出这些事实后說：“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执行计划的第一个十年中，极少数人的财富是增加得多么厉害！”^①

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在印度的所謂“计划化”经济中，究竟是哪一种规律在起作用：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还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尼赫鲁政府在早些时候的工业政策决议中，曾规定过限制私人资本创办某些工业企业。实际上，限制私人资本创办的一些部门，大都是私人资本当时所无力经营或者不愿意经营的。执行了两个“五年计划”，私人垄断资本有所加强以后，“限制”逐渐地消失了，原来不允许私人创办的一些重要工业部门，如石油、肥料、铝等，都向私人开放了。私人企业“国有化”的问题被无限期搁置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更明确提出，在经济建设中，“国营”部分和私营部分都有“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许多方面它们的活动是相互补充的”。

印度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官僚垄断集团，它同时又为私人垄断集团服务。看来，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非常懂得如何利用国家机器替自己谋利，他们熟练地运用“假公济私”的办法攫取国民财富。印度私人垄断集团的首脑及其代理人，不仅参加“国家计划”决策和咨询机构的工作，而且直接参加“国营”企业的管理，担任重要企业的董事或董事长，例如，塔塔担任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国营”企业的经理和技术人员往往要从私营企业调用，或者公私兼任。许多政府高级官员的子弟以及退休的官员、军

官等在私营公司任职，领取高薪。同时，大量“国营”企业以“股份公司”或“混合股份公司”的形式同私人康采恩合伙。这类“公私合营”企业的数目不断增加。有的“国营”企业还把一部分股票在市场上抛售，转入私营企业之手。总之，尼赫鲁政府通过国家垄断资本这条渠道，利用各种形式，使国民收入源源不绝地流入资本家和官僚们的腰包。

帝国主义资本的附庸

印度的“经济计划化”，不仅是替少数剥削者造福而严重损害人民利益，而且替外国垄断资本谋利而严重损害印度民族的独立。

实施“经济建设计划”，需要解决资金问题。尼赫鲁在《基本看法》一文中不得不承认：印度很穷，而且有变得更加贫穷的趋势，没有多余的资金进行投资。尼赫鲁政府用来实行“经济建设计划”、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资金，除了依靠在国内通过财政税收、发行公债、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等残酷盘剥人民*

^① 见1961年4月25日《印度斯坦时报》。

• 根据尼赫鲁政府公布的数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尼赫鲁政府依靠国内债务（包括公债和半强制性的民间储蓄等）所筹措的资金为五十多亿卢比，占计划开支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六，财政赤字为四十二亿卢比，占百分之二十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债务增加到一百一十八亿卢比，财政赤字增加到九十四点八亿卢比，分别占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以上。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国营”部分基本建设投资 and 事业费总额中，来自增税（广大人民所负担的商品税）和国内债务的共占五分之二。增税部分比第二个“五年计划”提高百分之七十以上。

又据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印度时报》一篇文章的报道，一九六二年印度财政赤字达十八亿九千万卢比，公共债务占整个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二，借债占国家岁收的百分之二十。



以外，主要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

印度的国家壟断资本企业，除了一部分是从英国殖民政府所接收和贖买的产业外，大部分都是依靠外援兴建和扩建起来的。如年产鋼各为一百万吨的魯尔克拉鋼厂和杜尔加柏鋼厂，是依靠西德资本和英国资本建立的；波保尔重型电气设备厂，是依靠英国资本建立的。铁路、港口、水利工程、发电等是美国支配的世界銀行提供貸款和技术設備扩建和新建的。帝国主义资本的“援助”附有苛刻的条件，这在印度当然并不例外。

在印度三个“五年計劃”的“公营”部分投資中，外援的比重越来越高。据印度资产阶级經濟学家辛諾艾計算，印度第三个“五年計劃”外援的数目将相当于計劃投資总額的百分之五十四。^① 英国壟断资本在印度的喉舌《資本》周刊在評論这点时說：“可以公平地說，几乎整个第三个五年計劃都是依賴資金来源的这个部分(按指外援)，假如得不到这种外援，这个計劃将被毀棄。因为印度的外汇儲备已經低于被认为所需要的最低点。”^②

《印度快报》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报道，印度从現在到一九七〇年，需要外国經濟援助的数目，据估計約在一百三十亿美元上下，其中将近半数要由美国以貸款或“援助”的方式提供。(这个数字，跟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經濟顧問約翰·普賴尔·刘易斯在印度历时一年的調查所得出的数字相差不多。)

事实上，正如一九六二年八月号《亚洲团结》所載《外援和印度經濟发展》一文所說的，如果大大削減或停止外援的話，那末在印度将立即引起經濟大危机，使大批公司倒

閉，生产減縮，工人失业，通貨膨脹无法控制，就是說，将使整个国民經济生活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尼赫魯政府要那样不擇手段地爭取外援，把爭取外援特别是美援作为首要的国策。这个政府为了討到美援，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反华反共，直至挑起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大財閥比尔拉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在《印度斯坦时报》发表文章公开說，向中国发动“战争使我們得到西方一切友好国家的巨大同情，这样我們能期望将来得到更多的援助”。而美帝国主义也就以美援作为釣餌，使印度反动統治集团充当它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亚非地区兴風作浪，并借此控制印度經濟和市場。为了这个目的，一九五八年，美帝国主义通过世界銀行糾合了西德、英、日本和加拿大等国，組織了一个所謂“援印俱乐部”。这个新殖民主义組織，成了印度經濟的无上权威，尼赫魯政府必須仰承它的鼻息。印度現在是世界上得到美援最多的国家之一。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底止，尼赫魯政府已获得美援六十五亿多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在一九五九年尼赫魯政府积极反华以后获得的。

但是，完全可以想像，由此而付出的代价必然是巨大的，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所能够付得起的。上引《外援和印度經濟发展》一文憤憤然地說：“过分依賴外援造成了国耻”。一九六一年七月，正当美国答应对印度提供十亿余美元的“援助”之后，《印度时报》駐华盛

① 見1960年8月19日《印度斯坦时报》。

② 見加尔各答《資本》周刊1960年7月7日社論。



頓記者伏拉在发回新德里的一篇题为《带有条件的援助》的新聞中写道：“美国現在坚持，在要求援助以前必須证明这是值得的。……美国专家首先要研究求援国的預算，它的工程、計劃及其結構。他們将要审查財政政策，以便发现用什么来制止通貨膨脹；他們还要审查它的經濟政策，以便考察它是否热心于吸引資本。”自从有“援印俱乐部”以来，这个組織每年总要开几次会来审查印度的經濟計劃和它的国际收支情况，并按年度和按情况給予“援助”。每次开会，都要指手画脚地对印度經濟計劃和經濟政策提出指責、批評和建議，如要求改善外国私人投資的条件之类。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援印俱乐部”會議休会，会上沒有决定向印度提供的外援的数量，这件事立即引起了印度市場的股票暴跌，金融騷动。由此可見，外援对于印度經濟具有多么大的权力！

由于乞求外援，尼赫魯政府不能不向外国壟断資本节节让步。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外汇儲备迅速消耗，財政开支不断扩大，而工农业生产又一度停滞和下降，資金越来越困难，这种让步尤其显著。国有化的政策实际上取消了。正式宣布允許外国投資者可以将賺到的全部利潤汇回本国。对外國資本实行免稅、降稅或延长創业期免稅权年限等措施。一九六〇年六月，尼赫魯政府同美国簽訂在新德里建立“投資中心”的协定，作为美国資本侵入印度的情报和聯絡机构。为了报答“援印俱乐部”的“援助”，尼赫魯政府还不断采取措施，欢迎和鼓励外国壟断資本投入印度許多重要工业部門，如工业机器、有色金屬、电力、工作母机、化肥、石

油等。

特別要提一下的是，外国資本和印度資本（包括国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合营的企业迅速地增长了。合伙經營，是外国資本滲入和控制印度經濟的重要手段。英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种手段保持自己在印度的經濟地位。美国壟断資本接踵而至，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在印度宣布独立后的头三年，尼赫魯政府同外国資本合作的項目只有几十項，一九五八年增至一百零九項，一九六〇年增至三百九十項，一九六一年增至四百零二項。从这里可以看出印度大資產階級同外国壟断資本勾結的狂热程度。

据印度儲备銀行公报（一九六二年十月）极不完全的統計，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底，外国在印度的企业投資总额（不包括銀行），由二十五点五八亿卢比增加到六十九点零五亿卢比，即几乎增加一点七倍。其中，英国資本虽仍居首位，但美国資本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英国。一九五九年后的变化趋势更是如此。

外国壟断資本从印度获得的利息和利潤是惊人的。尼赫魯本人也說：“英国公司現在（在印度）賺得的利潤比在英国統治时期还多”^①。据《印度斯坦时报》特派記者报道，到一九六二——六三年度（即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尼赫魯政府所欠外債将达一百五十二点零七七亿卢比，应支付的利息将近五亿卢比。另据印度儲备銀行公报公开发表的也是极不完全的統計，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〇年，外国資本直接控制的公司所得利潤达

① 印度《閃电》周刊1963年3月2日。



二十七点六八亿卢比，其中汇回本国的达十八点四六亿卢比，占全部所得利潤的百分之六十七。利潤再投資为數甚少。这个事实从另一方面說明了印度缺乏建設資金的原因何在。

帝国主义終究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資本的掠奪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它的“援助”到达那里，那里实际上就会沒有真正的經济主权和經济独立。宣布独立后的印度，虽然在形式上冲破了殖民地的政治外壳，但是并没有实际改变它的經济內容。相反，随着帝国主义“援助”的增加，特別自一九五七年以后，印度經济实际上进一步殖民地化。

事实充分說明，尼赫魯政府用所謂“計划化方法”、用外国“援助”培植起来的买办性的国家壟断資本，不仅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成分，像現代修正主义者所說的那樣，不仅不是促进国家經济独立发展的力量，像某些經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樣，恰恰相反，它是和人民利益为敌、阻碍国家經济独立发展、使印度經济淪为外国壟断資本附庸的一种力量，正好像它不仅沒有限制私人壟断資本的发展反而是帮助私人壟断資本的发展一样。这种买办性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正是当前印度貧困的重要根源之一，它的发展表明尼赫魯政府是彻头彻尾代表印度反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和外国壟断資本的利益，严重損害印度广大人民的利益，包括印度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至于在这样的經济基础上，会产生怎样的内外政策，自然不难作出判断，关于这一点，我們在这里不准备来談論它。

尼赫魯的新宗教

帝国主义学者和一些現代修正主义者差不多都认为，帝国主义資本“援助”不发达国家，是这些国家經济上所必要的。他們胡說什么帝国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的奴役和剝削，現在已經变成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所謂“經济援助”。他們把論证这种“援助”的必要性的“学說”，这种替新殖民主义辯护的反动理論，定名为“不发达經济学”。然而他們也无法否认，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向一些不发达国家提供了許多“援助”，而那些不发达国家的經济情况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日趋恶化。印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們不得不为此作一点辯解，說什么受援国必須具备某些必要的条件才能使“援助”發揮預期的作用。美国一位資產階級經济学家、現任美国駐印度大使約翰·加尔布雷思，他认为这些条件应当是：一、人民有“相当程度的写讀能力”以及一个“相当大的受教育的优秀分子集团”(应讀作：有相当多的有文化的奴隶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知識分子)；二、“相当多的关于社会正义的措施”(应讀作：有相当多的压制和欺騙人民的反动措施)；三、“一个可靠的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应讀作：有一个忠实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政府)；四、“对于发展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应讀作：要死心塌地地按照帝国主义的意旨行事)^①。对美国大使的这种看法，尼赫魯和他的政府怎样評价，我們不得而知。無論是尼赫魯政府也好，美帝国主义分子也好，他

① 見美国《外交季刊》1961年4月《經济援助的新极看法》一文。



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会向人民說明真实情况。例如，尼赫魯把印度“有变得更加貧穷的趋势”的原因仅仅归之于印度“人口的不斷增多”。

我們在一开始时提到的《喀拉拉邦》一书的作者，倒是多少向讀者說明了一点真实情况的。他在一九五八年所写的这本书中这样說：“如果我們把英国人統治期間所遺留下的因素撇开不談，那末，使印度人陷入日益严重的灾难中的唯一根源就是国大党的十年統治。”“人民和国大党之間”出現了“日益加深的敌对性的鴻沟”。“我們面臨着一場把整个国家都席卷在里面的經濟和政治危机”。他并且說：“英国用尽了举国的武力也沒有能够制服群众由于飢餓和痛苦而激发起来的正义憤怒和行动。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印度政府就不会激发起同样的憤怒情緒”。

国大党和尼赫魯提出所謂“社会主义式样社会”的口号，就是同这种情况密切相关。在第一个“五年計劃”尚未終了的时候，印度公众对于国大党統治就表现出强烈的不滿，經濟和政治危机日益显露。而印度民主进步势力的影响則越来越扩大，在选举中与国大党对抗。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建設的成就，特别是作为印度邻邦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巨大成就，在印度人民中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代表人物乞灵于“社会主义”这块招牌，企图拿它作为自己殘酷專政的一种甜蜜补充手段，給自己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行徑塗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借以欺騙人民，从而保全自己的統治。

尼赫魯迫于国际国内的情势，他正像《喀

拉拉邦》一书所引用的国大党的一位前任首席部长——汉努曼撒亚——所說的那样：从美国等西方国家抄襲了一些政治思想，又从俄国和中国抄襲了一些观念，像十六世紀印度莫臥儿王朝的阿克巴皇帝一样，自創一种新的宗教——在尼赫魯就叫做“社会主义”，来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战。尼赫魯一面用“社会主义”的口号粉飾自己，一面又把科学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論。他在《基本看法》一文中誹謗說，共产主义崇尚暴力和消灭个人自由，它“只想通过暴力，实际上就是想通过破坏和毁灭来实行改革。法西斯主义曾具有这一切暴力和大規模屠杀的恶劣方面”。尼赫魯这样說，其目的显然是妄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威信扫地。

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对社会主义深惡痛絕，但他們又企图用社会主义的口号来招搖撞騙——这就是国大党阿瓦迪年会決議的由来。

那末，尼赫魯的新宗教即他所說的“社会主义”，究竟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呢？

照尼赫魯看来，現代的资本主义已經变了。他說：“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民主无疑地減輕了它的許多弊病，而且現在它实际上已經不是前一两代那样的资本主义了。”^①但它本身还有待克服的缺点。“因此资本主义本身发展了某些社会主义成分，而同时又保存了自己的基本特点。”“我认为下面的看法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的許多思想逐渐为资本主义制度吸收，因此它們之間巨大的距离正日益縮小”^②。社会主义的什么思想逐渐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吸收了呢？尼赫魯认为，这

^① 見《基本看法》一文。



就是计划化的方法。计划化可以消除资本主义本身的缺点，因为它是“一种经过周密考虑的巩固基础和加快发展速度以使社会全面发展的方法”^①。

这就是说，在尼赫鲁看来，他们的“社会主义式样”的社会制度不是别的，它就是一种吸收了“计划化方法”、而同时又保存了“资本主义基本特点”的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我们从上面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接受”计划化方法，或者“吸收”计划化方法的资本主义，既不是尼赫鲁所说的什么社会主义，也不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能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这些都不过是奇谈怪论；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这样做甚至也谈不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它的结果只是使印度经济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尼赫鲁口头上说用“计划化方法”来“使社会全面发展”、达到“社会主义”。实际上，他是用所谓“计划化方法”来发展官僚买办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制造印度的贫困，并且妄图“消灭”社会主义或遏制社会主义的影响。如此而已！

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说：共产党人应当“揭露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把自私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的企图，揭露资产阶级政客为了同样目的利用社会主义口号招摇撞骗”^②。但是，印度国内的一些修正主义者，不但不揭露尼赫鲁集团把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狭隘阶级利益冒充为印度全民族利益的无耻企图，反而不断地向印度人民宣扬什么尼赫鲁集团的政策代表了印度全民族的利益，要印度人民无保留地团结在尼赫鲁的周围。他

们对于尼赫鲁的“社会主义”不但不加以揭露，反而要印度共产党人和印度人民相信，尼赫鲁的确是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应该无条件地加以支持。他们这样做，是帮助反动资产阶级来腐蚀无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企图用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其实，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之百般吹嘘的尼赫鲁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本身并不认真对待。一九五六年五月，即在国大党阿瓦迪年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式样社会”的决议后不久，尼赫鲁的后台老板之一、印度大财阀甘·达·比尔拉访问美国，他在纽约一次有六十个美国银行家和工商业垄断资本家参加的会议上，特地解释了尼赫鲁政府的经济政策。他说：印度的资本家对尼赫鲁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式样社会”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而且能够得到各种好处”。并说：尼赫鲁政府所企图取得的不外是美国已经取得了的东西，印度的道路就是走美国“福利国家”的道路。^③

这位印度大财阀的解释，真可算得上是一针见血！尼赫鲁新宗教的欺骗作用，当然不可能在印度人民中保持多久。企图用这种新宗教来欺骗人民的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他们这样做的实际结果，同他们的如意算盘相反，恰恰只会进一步暴露自己的丑恶面目，促进印度人民的新觉醒，从而加速自己的破产。

① 见《基本看法》一文。

② 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③ 见1956年5月3日《印度斯坦时报》。



关于资产阶级国有化

· 有 林 ·

目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项基本革命原理，都在遭受着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空前严重的歪曲和糟蹋。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理論陣地，因此它特别遭受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猖狂攻击。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同右翼社会党人一样，在篡改这项基本原理时，都在国家壟断资本主义、特别是资产阶级国有化問題上大做文章。他们极力鼓吹实行以国有化为中心的一套所謂“改革”，是无产阶级反对壟断资本的新的斗争形式和方法，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壟断资本主义包括着多方面的内容（由国家投资创办企业、把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以及通过财政、信贷种种方法实行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控制等等），国有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拟从资产阶级国有化的现状、资产阶级国有化的本质、资产阶级国有化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方面提出一些材料和看法。

的手工工場改革成现代化的企业。同时，出于战争、财政和经济上的需要，资产阶级国家又通过投资创建和收买企业的办法，逐步扩大了国有经济。但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范围都很有限，它主要是兵工厂、邮政、电报和铁路等企业和部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空前严重，资产阶级国有化便被作为拯救濒于破产的大资本家的措施而加以较广泛的实行。例如意大利政府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经济危机中，投资二千五百亿里拉（一九五三年价格，下同），收买了破产的意大利贴现银行和同它相联系的一些工业公司；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中，又投资近一万四千四百亿里拉，收买了作为意大利金融资本活动中心的三家最大的私人银行，和同它相联系的许多工业企业。这些银行和企业，当时已经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又如德国政府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经济危机期间，为了挽救濒于破产境地的大银行和大企业，曾大量收买它们的股票。据希特勒政府的经济部长沙赫特的一次供述，在一九三一年德国政府控制了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德国银行，并从而控制了许多股份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产阶级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很早就有了“国有经济”。资产阶级国家一诞生，便把封建国家经营的壟断企业接收过来，并把它们由原始



国有化虽然有了較多的发展，但是，整个說来，那时国有化的規模还是很小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产阶级国有化有了更大的发展。以西欧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例，可以看出，在这些国家里，国有企业的比重都比較大。

战后，英国在实行资产阶级国有化方面走在最前头。它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便通过了英格兰銀行国有化的法令，接着又連續在大約三年內通过了五次国有化法令。到一九五一年便陸續把英格兰銀行和煤炭、电力、煤气、国内运输等部門和部分冶金企业实行了国有化。采取国有化措施后，如下一些部門和企业变为国有：約一千五百个矿井和一些煤炭加工、制磚企业；铁路以及铁路車輛和铁道部門的附屬旅館，內河船只通过的运河和港口业务，大汽車站；煤气厂和煤气管道；大約五百家电厂以及輸电系統；国际有綫电报和无綫电报体系；航空站和全部民航机。此外，还有一些原子能工厂和兵工厂。据估計，目前英国的国营企业約占全部工业的五分之一；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接近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奥地利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化規模比較大的国家。它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和一九四七年三月，連續通过两个国有化的法令，把大多数煤炭企业、最主要的冶金工厂、有色金属工厂、采矿企业、煤矿、电站、制鋁企业、氮肥制造业和一部分机器制造企业国有化了。目前国有企业在几种产品的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是：鋼铁生产和煤炭开采的百分之九十八，鋼材生产的百分之九十，有色金属生产的百分之九十四，石油开采和提炼的

百分之九十一，电力工业的百分之四十六，机器制造和鋼结构制造的百分之三十一。国有企业的产量約占全部工业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八。在金融方面，于一九四八年把联合信用、信用机关和农业銀行等三家奥地利最大的銀行收归国有。

法国在一九四五年底和一九四六年期間，曾把某些經濟部門和某些部門的主要企业国有化。这主要是：煤炭工业、电力的生产和分配、煤气的生产和分配、国民工商等四家大銀行和为数頗多的保險公司。在法国，目前大約有六百五十个国家壟断资本企业和国家壟断資本同私人壟断資本合营的企业，整个国营工业的生产能力約占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二十。

在意大利，国有化的程度在战前就比較高，战后意大利政府通过工业复兴公司、机械工业投資基金和其他机构，繼續收买破产企业的股票。仅在一九四七——一九五五年，在这一方面便付出二千多亿里拉。意大利議会在一九六二年秋天通过的私营电力企业国有化法案，今年一月已开始实施；与此同时，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壟断資本組織——国家电力公司。据統計，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壟断資本組織——工业复兴公司所屬的企业的生产量，占全国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七点四，占鋼产量的百分之五十点五，占鋼材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五，同时，它还掌握着一部分电力生产；国家碳化氨公司控制着全国甲烷生产的百分之九十二，炼油的百分之三十；国家电力公司控制了絕大部分的电力生产；机械工业投資基金和科涅公司分別控制着部分机械制造和采矿工业。根据大概的



估計，目前意大利国家壟断資本企业以及国家壟断資本同私人壟断資本合营的企业在国家經濟中的比重，約占百分之三十。

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較多地采取了国有化的措施，目前也有很大数目的企业完全或部分属于国家。国家参与了許多专业信用机构，并在許多工业部門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国家壟断資本企业和国家壟断資本同私人壟断資本合营的企业的产量，在煤矿业中占百分之二十六，在炼焦业中占百分之十八点五，在铁矿业中占百分之五十一，在制鋁业中占百分之七十二，在小汽車制造业中占百分之四十二，在造船业中占百分之三十。一九五八年，国有企业和有国家資本参加的企业的資本，达四十九亿二千七百万馬克，約占西德全部股份資本的百分之十八点三。

二

工人階級的各式各样的叛徒，极力利用战后資產階級国有化发展較快的情况为資本帝国主义制度进行辯护。右翼社会党的領導人和“理論家”，硬把資產階級国有化叫作“建立社会主义經濟的最重要的經濟政治措施”，把資本主义的国有企业称为“社会主义成分”，硬說国有化“完全消除資本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統治”，而“一劳永逸地消灭了人剝割人的現象”。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說，資產階級国有化“是用非社会主义方法来实现消灭私有制”，是对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

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嗎？让我们透过資產階級国有化的对象、方式和后果来看看資產

階級国有化具有怎样的性质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資產階級国有化的对象来看，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

第一，是一些极端落后因而已經获利不多的部門。例如，在英国的工业部門中，最先实行国有化的是煤炭工业，这个部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进入了衰落时期，到实行国有化前，基本上还是沿襲着十分落后的开采方法，装备已經非常陈旧，机械化几乎沒有实行。在这样的設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生产率自然是低下的。一九四五年每个工人的平均开采量仅为二百一十六吨，这个数字不仅低于其他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甚至远远地低于英国一八七三至一八八二年的水平。英国铁路部門的状况和煤炭工业差不多。一九四八年有八千多台机車（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超过了使用期限。据一九四七年統計，在总数約一百二十五万辆貨車車廂中，大約有二十万辆正在或等待修理，而且車輛的数量在一年一年地减少。英国鋼铁工业的技术水平也是落后的，高炉的生产率几乎只及美国的四分之一，鋼铁冶炼一工时的产量大約等于美国的五分之一。这些部門由于投資大而获利少，越来越使企业主处于亏损和破产的境地，同时，这些部門处于落后状态，势必影响到其他工业部門的发展和其他壟断資本家获取高额利潤。因此，占有这些落后企业的資本家早就想在不受大損失的条件下，甩掉这些包袱。而国家为了整个壟断資本的利益也需要把这些落后的企业拿过来加以整頓改造。国有化不仅使原企业主脱离了破产的險境，而且保证他們获得了比以前更可靠的收入，并且对整个壟断資本的扩



展和获得高额利润也是有利的。

第二，是一些遭到战争严重破坏而资本家无力恢复的企业。例如，奥地利在战争结束时，收回了被德国垄断资本强占去的大批被战争破坏了的的企业，但是，由于战争的摧残，资本家已无力来占有这些企业；特别是没有力量对它们进行投资，使之恢复过来并可以获利。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由资产阶级国家把它们拿过来。奥地利资产阶级赞同这些企业归国家所有，是具有极端自私的动机的。这就是，企望资产阶级国家来恢复和重新装备这些企业，以便获得低价的商品和服务。

第三，是那些实行国有化后能为垄断资本家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动力的部门和企业。意大利今年实行的电力国有化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国家的电力供应，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于工业、特别是化学等新兴工业进一步扩展的要求。由于电力垄断资本家只有在保证获得更高的利润的条件下，才肯大量投资扩大生产设备，才肯把大量的电力输送到缺乏电力的落后地区，这就同所有用电的垄断企业获得足够的廉价动力供应的要求发生了矛盾。为了满足垄断资本家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要求，意大利统治集团实行了电力企业的国有化。出于上述目的而实行国有化的，还不止是意大利的电力企业。像某些国家有些银行的国有化，主要也是为了使垄断资本家们能够获得条件优惠的贷款而实行的。英国的电力国有化，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第四，是一些军事以及同军事直接有关的企业。对这些企业实行国有化，主要是出

于扩军备战的需要。

资产阶级国有化，是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对私人资本家的企业进行高价收买而实现的。以意大利为例，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期间，意大利政府曾经在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一落千丈的情况下，按危机前交易所的所谓“正常”价格高价把商业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罗马银行的全部股票收买过来。这个国家在一九六二年秋天通过的电力企业国有化法案规定，按资本加利润的原则付给电力资本家高达一万五千亿里拉的补偿费。而且对尚未付完的贖金，还要付给百分之五点五的利息。战后奥地利政府的法令规定的对全部国有化企业的补偿费，比原来的股份资本多二点六倍；对电站的补偿费则比原来的股份资本多五点五倍。英国的铁路公司以价值五亿英镑的股票，从政府换得约十亿英镑的公债券，煤矿工业的原资本家所得到的四亿英镑的补偿费，也超过了被收归国有的矿井价值的许多倍，汤姆斯·蒂林公司更以四百四十二万英镑的股票换得英国政府二千四百八十万英镑的补偿费，即用六英镑债券换一英镑股票。资本家从公债得到的高利比原来的股息要多得多。例如英国铁路公司的股东，在国有化以前多年以来差不多就没有从自己的股票中得到什么好处，只有在个别的年份他们才偶尔得到不超过百分之一点五的股息，而国有化后，他们获得的收入则约达百分之五。实行国有化对原企业主来说，实际上只是改换了一下名义，国有化后的企业的利润绝大部分都要交给他们，有许多企业的利润甚至全交了还不够。例如英国的铁路部门从一九四七至一九五八年



間，每年平均利潤为二千八百多万英鎊，而每年拿出付給原股东的利息，則高达四千五百万英鎊。这一切，充分地证明了列宁的科学論断：“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壟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門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①。英国艾德礼政府的燃料和动力大臣辛威尔曾不得不承认，英国的“采煤工业已病入膏肓，許多人将高兴摆脱煤矿。”他說：“政府必須剝夺某些煤矿所有者的財產，但是，难道他們就未因此而狂喜嗎？”英国工党前領袖盖茨克尔在《社会主义与国有化》的小册子中也曾招认，英国政府为实现国有化所进行的补偿，使壟断資本家获得很大的好处，“只是所表現的形式是利息而不是利潤或紅利罢了”。

资产階級国有化不仅对出让企业的資本家有利，而且对整个壟断資本家都是有利的。资产階級国家經營企业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保证壟断資本家取得高額利潤。它执行有利于壟断資本家的价格政策，使所有的壟断資本家都可以从国有企业中获得廉价的原料、材料和动力等，从而降低自己产品的成本和提高利潤。例如英国在一九三八——一九五七年間，加工工业产品的批发价格增长了百分之二百零四，可是电力的平均价格才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九，铁路運費也只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五。一九五二年英国煤炭工业开采的煤，有一半是以賠本的价格出售的。法国的煤炭部門实行国有化后，煤价一直低于成本費。当然，优惠的价格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享受的，它只提供給壟断資本企业。按照法国的电费分級标准，在一九五一年电化企业和电力冶炼业用电一度收費一点零八

法郎，而住戶消費者使用一度电却要花二十六法郎。西德北萊因——威斯特伐利亚州的国家发电站所生产的电力，百分之七十供給工业企业使用，只有百分之三十供給个人消費者。但从这百分之三十所取得的利潤却比从那百分之七十所取得的还多。不仅如此，壟断資本还从国有企业获得有利的訂貨。国有企业的訂貨，大多数是秘密进行的。秘密訂貨对大壟断資本特别有利，通过这种办法，它們可以从中取得比公开承包多得多的利潤。英国的威廉·丹尼兄弟公司承包的建造英吉利海峡新火車輪渡的訂貨，便是很好的例子。这艘輪渡的造价，最多不过一百零八万六千英鎊，可是英国运输委员会却花了一百五十万零九千英鎊。资产階級国家的国有企业用低价向壟断資本家提供商品，用高价向壟断資本家买进商品，給了壟断資本家以极大的利益。据法国的材料，法国鋼铁和化学等工业部門的壟断資本家，在一九四七——一九六〇年期間，便通过这种形式获得高达三万亿法郎的好处。

资产階級国家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处于大壟断資本家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从国有企业領導机构成員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国有化后，原来的企业主搖身一变成了国有企业的領導者；别的壟断資本家为了各自的利益，也都尽力向国有企业的領導机构伸張自己的势力。結果坐在国有企业管理局和公司領導位置上的，不是壟断資本家就是他們的代理人。一九四九年艾德礼在議會回答质詢时曾供认，当时英国各国有化中央管

^①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0頁。



理局的一百三十一个委员中，有将近一半是过去私营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其余的委员中有三十多个是爵士、地主和将军。又据同年英国的另一个材料透露，在国家运输公司的十三个理事中，有七个是私人公司的董事。管理煤矿工业的，全是垄断资本家的代表。在法国，实行国有化后，原来的管理人仍然留在企业的理事会里，从而继续掌管着这些企业。特别是在银行管理处的，差不多还是原先那些人。在奥地利，国有化的银行，实际上是大垄断资本家所支配的信用机关，因为他们这些银行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这个国家的国有企业的实权，也是操在大垄断资本家的手里。在西德的国有企业中，领导人员也是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占绝对优势。至于意大利，情况更是如此。这个国家的国营企业，除了一小部分如铁路、军事工业、邮政和城间电话等由国家直接管理，大部分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对这些企业，国会无权监督，它们也不受政府的管理。根据今年一月九日罗马《晚邮报》的报道，意大利各政党已经达成协议，由电力垄断资本家、金融寡头迪卡尼约担任新成立的国家电力公司的董事长。国有企业的管理机构由大垄断资本家掌握着领导权，就使企业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经营。为了欺骗群众，垄断资本集团也常常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机构中摆上几个所谓“工人代表”，但这完全是一种装饰品。因为第一，决定权始终牢牢地控制在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手里；第二，这些所谓“工人代表”，都是由垄断资本集团培养和挑选出来的忠实于它们的工具；第三，如果有哪个“工人代表”表示一点不驯服，垄断资本

家便可随时把他换掉。因此，摆上装饰品这丝毫也不妨碍垄断资本集团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资产阶级国家为垄断资本服务，不仅是通过收购企业的形式，而且还通过卖还国有企业的形式。被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的企业，很多都是经过国家大量投资而改变了原来的陈旧落后状况的。对许多企业来说，实行国有化，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利用国库资金（即人民缴纳的税款），来替资本家更新固定资本，来为他们承担投资的危险。战后以来，在实行国有化的同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交替采取了把国有企业归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的措施。例如英国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取消了黑色冶金和部分公路运输业的国有化。奥地利在一九五七年把联合信用和林德尔两家国有银行百分之四十的股票出售给私人，其中绝大部分被垄断资本家买了去。西德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间，国营企业恢复并大大更新了固定资本，于是国有企业便成了各垄断资本家争夺的对象，并有许多国有企业和股份被“非国有化”。在意大利，据不完全统计，自从工业复兴公司建立到一九五八年为止，先后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的国有股票达四千九百一十亿里拉。就是在没有实行国有化而用政府投资创办的方式建立国有企业的美国，也采取了把国有企业卖给垄断资本家的措施。战后不久，美国政府在战争中所建立的企业，大部分都变成为大垄断资本的财产。国有化是国家对私人企业进行高价收买，把国有企业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则是以低价出售。如美国犹他州日内瓦城的一个大工厂，费了国家两亿美元，而美国钢



铁公司用四千八百五十万美元便把它买去了；共和钢铁公司购买芝加哥附近的冶金工厂花了三千五百万美元，而国家为这个厂花的钱却是九千一百万美元。今年一月中旬，英国政府卖给垄断资本家的三个国营钢铁公司，财产总值为八百五十万英镑，而垄断资本家买进这些企业却只花了五百七十万英镑。就在同一个时候，英国政府卖给另一家垄断公司的两个国营炼铁厂，实际价值是二百六十万英镑，而卖价却只是一百五十万英镑。可见，无论是国有化还是把国有企业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都是为了垄断资本家的利益。

资产阶级国有化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它都是垄断资本利用国家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它给垄断资本带来极大的好处，但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它所带来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右翼社会党人所吹嘘的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消灭了剥削”的谎言是何等的虚伪和无耻。国有化后，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例如，英国的煤矿工业，在没有改变技术装备的条件下，主要依靠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每个工人每年的平均采煤量，一九五二年比一九四七年提高了百分之十六。国有企业的劳动条件极端恶化，工伤事故不断增加。英国一九五五年有三分之一的矿工受过伤，有四百二十五人死亡。采煤工业中每年登记患肺尘埃沉着病的有四千人次，每年有七百到八百名矿工死于此症。国营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依然很低。一九四八年，即英国工党执政的时期，工党分子弗伦

西斯·威廉斯就直截了当地向英国工人提出：“国有化对于工人阶级决不意味着他们所期待的较轻松的时代的到来；它意味着号召工人更加紧张地工作，而不要任何补偿”。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中，也处于比以往更加不利的地位。资本家在“社会利益”的借口下，肆意向工人阶级进攻，工人如果进行反抗，资本家便以国家行政官员的身份来进行镇压。

资产阶级国有化不仅给国有企业中的工人，而且也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在实行国有化（以及把国有企业卖还给私人垄断资本）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去填满垄断资本家的钱袋，而这就必然加剧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付给原企业主补偿费（据统计，英国资本家从整个国有化部门获得的补偿费总额高达二十五亿英镑左右）而大量增发国债，势必加剧通货膨胀，使得货币进一步贬值，物价更加高涨；为了支付国债利息（一九四七年一年英国煤炭工业的原所有者便获得了一千五百一十二万英镑利息；电站的股东们一九四九年一年获得的利息高达一千三百万英镑左右）、贴补国有企业的亏损（这是由于廉价供给垄断资本家商品和服务而造成的）和更新收归国有的企业的设备而扩大政府预算开支，势必加重劳动人民的税负。以英国为例，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年间，工人和职员直接税和提成，增加了将近九倍；目前各种税负，几乎占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同时期内，英国的零售价



格上漲了一倍还多。由于稅負加重和物价暴漲，工人的实际工資並沒有多少提高。一九五七年，意大利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資仅及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一九五八年后也提高很少。法国劳动人民現在为了挣得一九三八年时所挣得的錢，就必须比一九三八年多做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

資产階級国有化对广大劳动人民具有不利的后果，列宁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深刻地論证过了。他指出：“在保持生产資料私有制的情況下，所有这些使生产更加壟断化、更加国有化的措施，必然会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剝削和压迫，增加被剝削者反抗的困难，加强反动和軍事专制，同时，必然会使大資本家靠剝削其他阶层而得来的利潤急剧增加，必然会使劳动群众由于要向資本家繳付数十亿借款利息而遭受几十年的奴役。”^① 現在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列宁这一論断的正确。

国家的性质决定着国有化的性质。資产階級国有化所以完全有利于壟断資本家而不利于广大劳动人民，是因为資产階級国家是壟断資本的馴服工具。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美化資产階級国有化，首先是因为他們歪曲了資产階級国家的性质。他們把資产階級国家說成是一种超階級的东西，說它“不再是資本主义社会中某一階級的机构了，它不再反映和維護这一階級的特殊利益了”，或者像右翼社会党人所說的，已經是“为全体社会服务的”机关了。

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义者和右翼社会党人美化資产階級国家，但是，人們看到的事实

却是，資产階級国家从来就是“管理整个資产者階級共同事务的委员会”^②，是資产階級压迫和剝削劳动人民的机器。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壟断資本完全把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們不仅在政府机关中安插自己的代理人，而且还亲自出馬任国家要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普遍趋向。美国是号称“民主社会”的榜样的，而正是在这个国家里，統治机构被壟断資本牢牢地把持着。在肯尼迪政府的主要成員中，大資本家占一半多，其余的也都是他們的亲信。意大利范范尼的所謂“中左”政府中的二十四個部长(包括总理)，有十九个是代表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利益的天主教民主党人，其余的几个，也都来自实际上代表資产階級利益的党派。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即壟断資本家不亲自出馬，而仍然基本上由它的代理人来执政，在非常情况下，甚至可以让右翼社会党人出来做一下擋箭牌。但这絲毫沒有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資产階級专政国家的性质。这一方面是因为右翼社会党人同样是壟断資产階級的奴僕，另一方面由于壟断資产階級掌握着国家的經濟命脉、是經濟生活至高无上的統治者，因而只有它們才有力、有权力决定資产階級国家的根本政策，而不論是誰上台执政，都只不过是它們的意志的具体执行者。恩格斯曾經指出：“現代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列宁全集》第24卷，第277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68頁。



国家,無論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資本家的机器,資本家的国家,理想的集体的資本家。它愈是把生产力更多地掌握于自己手中,它就愈益完全地轉成为集体的資本家,愈益剝削更多的国民。工人还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資本主义关系沒有被消灭,反而达到了极点,达到了頂点。”^① 不打碎資產階級国家机器,不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怎么可以設想資產階級国有化能够有利于工人階級和广大劳动人民而不利于壟断資產階級呢? 怎么可以設想能达到什么“社会平等”的目标呢?

三

正确認識資產階級国有化的历史作用、区分資產階級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国有化的不同性质,是分析資產階級国有化問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資產階級国有經濟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现代資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客观趋向。它的发展,使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这就为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基础,便于无产階級在夺取政权后实行生产資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同时,資產階級国有化加深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貧困化,从而加剧了階級矛盾,促进工人階級的革命化。这些,无疑都是无产階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条件。

在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資產階級国有化虽然为社会主义准备着物质前提,在客观上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促进的作用,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认为,資產階級国有

化是壟断資本集团为了維持它的反动統治而采取的措施,它是壟断資產階級利用国家名义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剝削和压迫的手段,資產階級国有化不是削弱(更不用說消灭)了壟断資本,而是加强了它对国家經濟生活的控制。因此,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从革命的观点去看待資產階級国有化的問題,他們认为沒有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决不可能通过什么資產階級国有化使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国有化就只能是資本主义的,就决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列宁在《論修改党綱》一文中就是这样明确地提出問題的。他說:“在革命的环境下,在革命时期,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直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在革命时期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我們的四月代表會議是估計到这一形势的,因而提出了‘苏維埃共和国’(无产階級专政的政治形式)以及銀行、辛迪加国有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措施)的口号”^②。

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立場完全相反,他們不区分資產階級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国有化根本不同的性质,而是把它們混同起来;不是抓住資產階級国有化造成的有利条件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企图在不触动資產階級国家政权的条件下,通过資產階級国有化和其他所謂“改革”“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們极力宣揚,資產階級国有化不是一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2頁。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0頁。



般的改良的措施，而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措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他们还说要争取全部生产部门国有化来废除垄断资本的统治。其实，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且全部生产部门国有化也是幻想。正如大量事实所表明的，垄断资本家只是在对他们非常有利的条件下把某些已无厚利可图的部门高价卖给国家，而决不允许去“化”占绝大多数的一帆风顺的部门的。特别是那些关键性的部门，他们一定要牢牢地把持。资产阶级国有化只能在不仅不影响反而有利于垄断资本集团对国家经济生活控制的条件下实行。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对通过资产阶级国有化“过渡”到社会主义，设想了种种方案，但就是缺少最根本的一条，即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看来，夺取政权的问题已经无关紧要。他们公开地叫嚷，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政权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起始阶段”了。

粉饰资产阶级国有化的实质，来为资产阶级效劳，并不是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创造。早在四十多年前老修正主义者就这样做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开始了总危机。当时，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都发生了革命的危机。为了引导群众离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些国家的右翼社会党人极力宣扬资产阶级国有化，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甚至还煞有介事地成立了“社会化委员会”（德国以卡尔·

考茨基为首，奥地利以奥托·鲍威尔为首），帮助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群众。等到资产阶级暂时稳定了统治地位以后，这个“委员会”便毫无结果地完蛋了。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于是资产阶级国有化又被右翼社会党人作为解救资本主义的药方提了出来，而且叫嚷得比以前还要卖力气。然而，高潮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是由于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极端尖锐，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极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垄断资本集团一方面比过去更多地实行改良的措施（如国有化、社会福利），来缓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另一方面则加紧欺骗宣传，说什么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过去，它已经变成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等等，它们还大力指使它们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代理人加紧散布种种幻想，以涣散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企图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濒于灭亡的命运。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资产阶级国有化问题上的甚嚣尘上的叫嚷，就是适应着垄断资产阶级的这种需要而发出的。如果说，当年老修正主义者使用欺骗人民的手法，没有能够达到他们阻止和取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罪恶目的，反而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叛徒面目，那末，在今天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已经更加觉醒的时代，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可耻企图就更加注定要归于失败。



高尔基的革命传统和战斗精神

以
群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方面是劳动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斗志昂扬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另一方面也是“一切活完了历史所给的时期的人物”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在那些年月里，高尔基曾经收到国内外不少人的来信。有许多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工人和农民写信给高尔基，以满怀信心的语调，深信生活的前进，最终会战胜一切困难，取得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然而，也有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写信给高尔基，发出种种敌视的叫嚷、诬蔑和咒骂。

在所有的叫嚷和咒骂之中，最激怒高尔基的，是某些外国的知识分子或流亡在外国的白党侨民知识分子责备他不写“真实”。有的“劝告”他说：“俄国因为布

尔什维克的罪恶而要灭亡了，这是你所应当写的”。有的甚至干脆指责他“看不见真实”。当时高尔基回答得很干脆，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真实本身就不是单一的，在苏联境内就存在两种真实，“其中的一个真实——是你們的、陈旧的、衰老的”，这是一个“愚笨的、卑小的、邪恶的真实，它为居住在苏联境内和境外的颓废派所喜爱的”；而另一个真实则“是年青的，血气旺盛的，充满着无尽藏的精力的，它热望向着自己的崇高目标前进，毫不回顾”，这就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斗争的真实，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复兴的基础”^①。

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社会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的旁观者，他必须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服务，因而，对于所谓“真实”，也就决不是无判断、无抉择的。用高尔基的话说来，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所面临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流血冲突越来越频繁”的年代，是“全世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年代^②。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高尔基认为一个革命的作家在接触到文学与真实的复杂问题时，他“应该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第一，什么是真实？第二，我们为什么需要真实？需要什么样的真实？什么样的真实较为重要？那个

① 《论犬儒主义》。《高尔基政论集》，时代出版社1951年版，第311—312页。

②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66页。



正在消亡的真实呢，还是我們正在建設的真实呢？”^①自然，具体地回答这些問題，是需要各个作家在創作实践中按照具体的情况加以細致的考虑而后才能作出的，但从总的原則上却必須做出坚定的回答，这就是高尔基所說的那句响亮的話：“我們正处在反对巨大的旧世界的战争状态中；旧的真实滚开吧！我們必須确定自己的真实。”^①

近年来，“写真实”已經被某些現代修正主义作家和资产阶级的頹廢作家当作一个时髦的口号，然而，实际上，在文学作品中不經過作家的选择和判断的所謂“純客观的真实”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們所不能也不敢回答的，恰恰是高尔基当年所提出来的問題：什么是真实？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真实？他們，不論怎样善于花言巧語，顛倒是非，但只要接触到这些根本性的問題，他們必定就无法躲閃，就不能不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出他們的真面貌。群众就会揭开蒙在他們身上的伪装，看清他們本身原是旧真实的一部分，于是對他們喊道：滚开吧！

自然，在社会矛盾还是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阶级斗争还是尖锐而激烈地发展着的时代，即使是先进的誠实的作家，要清楚地分辨真实的性质，采取正确的态度，也并不是輕易的。正如高尔基所說：“因为人們生活在两个世界的边缘”^②，现实中充滿着矛盾。对于作家來說，选择真实和判断真实的“复杂”和“困难”也正在这里。高尔基說，“人們受到历史上的两种力量——小市民阶层的

过去和社会主义的将来——的吸引”^③，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上，为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而义无反顾，坚决地清除自己身上的“衰老的个人主义”和陈腐的习惯势力，那么，要判断什么是真实，我們的时代、我們的群众需要怎样的真实，确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的。因此，高尔基总是反复地要求革命作家要有远见，提高阶级的警觉，关心现实，注視未来的发展。

作为革命的文学，描写过去的社会生活也是需要的，但是，批判地描写过去的最主要的意义也就在于肯定新现实、贊揚新事物，支持新事物的成长和发展，离开了这个目标，那么描写过去也就不可能产生深远的意义。作家如果脱离了当前的现实，忽視了未来的发展，也就不可能看清过去社会的真实面貌，而只能成为一个历史陈述的怀恋者，自然也就根本算不得革命的作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高尔基常常要求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要把“扩大視野、認識当代的现实”作为首要的任务^④，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必須和现实更密切地結合”，“应该积极地深入当代生活的問題，而当代的主要内容便是社会革命”^⑤。建

① 《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談話》。《文学論文选》，第130頁。

② 《談手工艺》。《文学論文选》，第180頁。

③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論文选》，第270頁。

④ 《和青年作家談話》。《文学論文选》，第294頁。

⑤ 《論文学及其他》。《文学論文选》，第106頁。



設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斗争，就是通过斗争达到改造旧现实、創造新现实的目的，因而是一种社会革命，这种革命的領導任务是无产阶级所承担的。

无产阶级的革命是“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各种观念”（《共产党宣言》）的斗争，因而，它不仅宣布旧世界的死刑，而且要創造新世界，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这一切，都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所不曾出現过的。因此，高尔基总是不断地強調革命作家要接触新现实，熟悉新现实，并了解它的意义，預見它的未来。他說：如果作家“自己不理解而且不对群众的革命目标和任务发生兴趣”，那就不可能求得人民大众对他的了解，正是“这些由于工人阶级的英勇劳动而成为现实的目标和任务，使生活具有了不断地而且蓬勃地进行創造的性质，从而产生了无数的新事实，新題材”^①。革命的作家如果不了解新的现实——不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和新事，他的創作源泉就必将枯竭，自然也就根本談不到什么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现实并不是風平浪靜的，如高尔基所說，是“狂風暴雨般的现实”，是充滿着矛盾和斗争的现实。在高尔基看来，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沒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有实现，就必然仍旧存在“各种不可調和的矛盾之間的斗争”^②，这是誰也掩盖不了的实际生活中的真实。而革命作家的任务就在于敏銳地反映这些矛盾和斗争，用鮮明的形象将它們表現出来，使它們成为

文学上的真实。

对于那些在改造过程中尚未清除掉的“坏的事实”，不用說，必須有“憎恨的热情”，“必須无情地揭露它們”，但是，革命作家的最迫切的任务还在于“闡明和描写我們的现实中一切稳步成长着的、本质上重要的、新鮮的、‘良好的’事物”。这是高尔基一貫的精神。在他看来，作家們所以需要了解旧事物，并不是为了旧事物本身，而是为了“从实际中、从过去的、衰亡了的事物与現在的、新生的事物之間的悲剧性斗争中去发现新事物”^③。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只有不为大量存在的旧事物所迷惑，而能从腐朽的旧事物的霉烂发酵的烟雾之中发现属于未来的火苗，这才是揭示了真实，因为这种从旧基地上闖出来的火苗迟早是必成燎原之势的。

高尔基自己是这样的作家，他也不倦地教导青年們这样地观察现实。他指出：在当时苏联国内的实际生活中，“还有許許多多应该受到嘲笑、必須与之斗争的現象”^④，他认为：看不到这些，就会忽視阶级斗争的存在，忽視扫除社会发展障碍的必要，而安于现状，对现状妥协。但是，革命作家的首要任务还在于看清社会发展的动力，看到社会矛盾中的主导力量，也就是他所說的“我

① 《談手藝》。《文学論文选》，第222頁。

② 《論剧本》。《文学論文选》，第253頁。

③ 《論初学写作者》。《文学論文选》，第64—65頁。

④ 《我国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文学論文选》，第408頁。



們畢竟還有更多應該加以表揚的人物”，“我們有值得歌頌的人物，而且這些人物越來越多”，這正是社會前進的動力。因此，他斷然地說：“需要歌頌，需要！”^① 這種歌頌不是為了美化現實、勸告人們滿足於現狀，而是為了鼓舞人們改造現實的鬥志，促進那些真正有價值的、重要的新事物更迅速地成長、壯大起來。

實際生活永遠是在矛盾和鬥爭中前進的，這種矛盾或鬥爭有時表現得很尖銳、很激烈，有時則又表現得很隱晦乃至很曲折，作家要分辨新生的事物和陳舊的事物，美好的事物和丑惡的事物，成長着的事物和衰亡中的事物，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高爾基反復地指出，作家必須站得高，看得遠。他說：“藝術的主要使命正在於上升到高於現實的地方，從新人类的始祖工人階級所提出的那些美好目標的高處來觀察當前的事情”^②。高爾基是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的革命作家，他的特點就是不僅是一個對於過去和現在的現實生活的敏銳的觀察者，也是一個對於未來滿懷遠大理想的藝術家，他主張“文學高於現實，能夠稍稍居高臨下地去看現實，因為文學的任務不僅在於反映現實。光描寫現存的事物還不夠，還必須記住我們所希望的和可能產生的事物”^③。高爾基認為：“我們的作家在生活上和創作上都必須高瞻遠矚，從高處——而且只有從高處——才能看清資本主義的一切醜惡的罪惡行為、它的各種血腥意圖的全部卑鄙性，才能看清專政的無產階級的一切英雄工作的偉大”^④。

然而，一個作家要高瞻遠矚地看現實，並使自己的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現實比實際生活更高，並不是可以憑空得來的，自然也不是可以依憑某種偶然的因素而求得的，他只能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裝，恰如高爾基所說：“科學的社會主義為我們創造了最高的精神高峰，從那里可以清晰地看見過去，指出一條走向未來的唯一的捷徑，從‘必然的王國到自由的王國’的大道”^⑤。這是他的經驗之談，也是對年輕一代的最正確的教導。革命的作家只有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站在發展中的現實的高處，以高瞻遠矚的眼光來看前進中的現實，然後才能解決什麼是本質的真實，什麼是浮表的真實；什麼是主要的真實，什麼是枝節的真實；什麼是發展着的真實，什麼是衰亡中的真實。而高爾基自己就是以畢生的精力來為本質的、主要的、發展着的真實唱贊歌的革命作家。

革命作家的主要任務自然是做好文學工作，將文學作為武器來為革命事業服務。然而，他們却又不能僅僅做一個不與聞外事的文學家，高爾基說得好：“我們蘇聯作家決不能只是一個作家，決不能只是一個職業文學家，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參加國內

① 《我國文學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文學》。《文學論文選》，第408頁。

② 《論劇本》。《文學論文選》，第245頁。

③ 《和青年作家談話》。《文學論文選》，第307頁。

④⑤ 《論短視和遠見》。《文學論文選》，第280、279頁。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富有毅力的人”^①。这也就是说，革命作家必须同时是一个革命的战士。因为“文学从来不是……个人的事业，它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②。

“生活在阶级社会的条件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在政治之外’的”^③。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纯粹的艺术”、“全人类的艺术”是根本不存在的。高尔基以他全部的作品来证明：几世纪以来，人类都生活在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之中；尤其是我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趋向灭亡的资产阶级正在以最愚蠢、最残暴的挣扎来维护它的统治地位，而新兴的无产阶级则在以最坚决的血腥斗争来推翻敌对阶级的黑暗统治。高尔基曾经庄严地问道，“在这样的阶级斗争中”，作家要“保持中立”是可能的吗？自然，他的答复是完全否定的。他设想，“或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我们必须为了时代的革命要求而牺牲自己吗？’”他肯定地回答说：“是的，必须改造自己，认清为社会革命服务是每个正直的人的切身事业，认清这种服务能给个人带来快乐。‘战斗中就有快乐！’”^④。对于一个革命的战士说来，生活的意义就是为革命服务，而高尔基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激烈斗争的时代，只有明确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革命作家才能面对真实，勇敢地用自己的作品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而一切公然地或躲躲闪闪地维护垂死的资产阶级的统治的作家，是决不敢、也不可能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真

实的，因为承认真实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己即将灭亡，就等于宣告他们自己的死刑。高尔基曾明确地指出：“真正的文化史——即阶级发展、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⑤，而现代文学艺术兴替演变的历史事实也总是证明：资产阶级的旧文学“随着作为它的老顾客和消费者的那个阶级的衰亡而悲惨地衰落下去”，而无产阶级的新文学“又随着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发展而迅速成长起来”^⑥。正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敢于面对真实，勇于反映真实，所以，也只有他们才能担当改造世界的革命任务，用文学的武器来加速腐朽的真实走向灭亡，促进生气勃勃的真实扩大阵地。恰如高尔基所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尖锐斗争中，革命作家的使命就是同时担当“产婆”和“掘墓人”的双重任务^⑦，从意识形态方面，一面催促新事物的诞生，一面消灭和埋葬旧事物。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形势面前，宣传“各阶级之间的和平妥协底可能性，只有由于进化，由于政治经济关系底渐进的、缓慢的发展才能达到人类底‘幸福、和

① 《我国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文学论文选》，第406页。

② 《论文学及其他》。《文学论文选》，第109页。

③ 《再论机械的公民》。见《瞿秋白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1741页。

④ 《论文学及其他》。《文学论文选》，第110页。

⑤ 《谈手艺人》。《文学论文选》，第181页。

⑥ 《论剧本》。《文学论文选》，第245—246页。

⑦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论文选》，第264页。



平的生活’”的說教，“除了害怕社会革命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根据”^①。因而，傳播这种說教的文学自然沒有任何的真实性可言，它不是掩盖真实，就是篡改真实，因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正是和他們的說教相对立的。

无产阶级的文学事业是艰巨而重大的阶级的、党的事业，它負有揭示社会发展的真实，并推动社会变革的重任，因此，高尔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求着我們文学家必須对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社会行为負严格的责任”，因为作为党的事业的一个組成部分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已經不是仅仅把作家“安置在现实主义文学历来所有的‘世界和人們的裁判者’、‘生活的批判者’的地位上”，而且給作家以“直接参加新生活的建設、‘改变世界’的过程的权利”^②。具有这样的权利的革命作家，就不仅要對文学事业負責，而且要对整个革命事业負責。他們所選擇、所反映的真实，都必須对革命事业有利。而在这一点上，高尔基正是一个杰出的身体力行者。

文学工作确实是需要独创性的工作，是最富于个性的工作，然而，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經驗和成就看作“个人的所有物”，高尔基认为“那就錯了”。因为作家的經驗是“现实生活所提示的东西”，而今天的“体现了群众的理性和意志的布尔什維克党所創造的新的现实生活”，正是党給予作家的“最好的礼物”；离开了这个基础，創作上的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所以，他认为：“我們的創作

按其形式應該是个人的，而按其基本的领导思想則应当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的”^③。这就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应当屬於阶级、屬於党、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的道理說得十分明确了。

由于革命的作家應該是一个革命家，是一个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他反映生活的真实，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就都不是目的不明或沒有目的的，他必須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十分明确的目的——为革命事业服务。因而，作为革命的作家，就不仅要清楚、正确地了解过去的真实和现在的真实，而且还要满怀热情地設想未来，为促使未来的理想的真实的实现而不遺余力地斗争。高尔基常常恳切地教导年輕的一代：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不仅要知道两种现实——过去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还必须知道第三种现实——未来的现实”。他认为这是“时代的革命的命令”，因为“要确切而清楚地知道你在为反对什么而战斗，就必须知道你所希望的是什么”^④。这也就是说，革命的作家必須明确地意識到：自己是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斗争。

任何时候——特别是阶级斗争激烈、尖锐的时候，在文学的队伍当中，总会出现一

① 《論现实》。《高尔基論儿童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頁。

② 《苏联的文学》。《文学論文选》，第359頁。

③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閉幕詞》。《文学論文选》，第369、370頁。

④ 《我国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文学論文选》，第409頁。



些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身边的利害的个人主义乃至自我中心主义者，他们有的经常动摇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势力之间，有的干脆从革命的营垒走向反革命的营垒，有的在反动的阵线当中转来转去，伺机换投新主子，而这类人渣的最漂亮的借口往往是“超阶级”或“非政治”。高尔基曾经指出，在本世纪初的欧洲文学界中，“许多人曾经狂热地和长篇大论地拥护艺术自由、创作思想自由，曾经百般断言文学之超阶级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文学之独立于社会政治以外。”^①

不仅当年的欧洲存在这样的人物，高尔基还指出：即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期间，也还存在类似的“个人主义者”，“这些人完全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满足于那帮助他们显露头角、取得方便地位的东西，满足于那巩固他们的个人主义者天生的漠不关心的态度的东西。”“他们已习惯于对个人生存的意义没有自豪之感的生活，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存自己渺小的琢磨得很不好的才能之暗淡的光辉、模糊的光彩。他们不懂得，个人生存的意义是在于加深和扩大劳动人类千百万群众生存的意义。”^②像这样的作家，在过去，只能成为脱离实际生活的“自我反省”或“自我表现”者，绝对不能反映出什么社会生活的真实；而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自然更不可能写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在和未来，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真实的反映者和描绘者。

尽管，在高尔基活着的年代，社会主义的苏联就早已建立起来，伟大的列宁已经给

苏联无产阶级提出了最崇高的目标，而千百万的无产阶级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坚强地战斗着；但与此同时，也还有不少如高尔基所说的所谓“稳健”的人、“冷静的聪明人”存在，“他们不参加战斗，只会巧妙地坐享胜利的果实”^③。这就是高尔基常说的“小市民阶层的过去”的继续。对于这些现象，高尔基曾经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那些把物质福利、安逸和舒适‘不顾一切地’当作偶像崇拜的人”，那些“即使在资产阶级文化普遍崩溃的今日，依然继续相信有可能安度个人稳固、轻松和‘美好的’生活”的人，他们的“信仰的基础”，就是“过去的历史使人养成的和教会所支持的利己主义”，而“兽性的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传染全世界的一种疾病”，高尔基说即使苏联也“还存在着被摧毁了的小市民阶层的许多余孽，他们或多或少地巧妙地装扮成‘社会的动物’，甚至爬进共产党员中间去，用尽狡猾、伪善和撒谎的力量——他们从许多世纪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力量——来保卫‘自我’”^④。这是高尔基对当时苏联社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最敏锐、最深远的剖析，他表现在社会活动和创作活动方面的坚定的革命战斗精神，正是以这种科学的剖析为基础的。作家如果没

① 《苏联的文学》。《文学论文选》，第333页。

②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闭幕词》。《文学论文选》，第367—368页。

③ 《和青年作家谈话》。《文学论文选》，第303页。

④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论文选》，第268—269页。



有这样的战斗的科学精神，也就看不出什么真实，自然更谈不到在作品中反映出什么真实。

曾經有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把高尔基描繪成所謂“人学”的宣傳家乃至人性論者，但是，事实是怎样的呢？高尔基从来不把“人”看作一个和諧的整体，而总是看作斗争着的对立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是少数“脑满肠肥”的人，另一方面是多数“饥寒交迫”的人；或者一方面是卑微、渺小、只看见“自我”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则是“伟大、勇敢而坚强”的新人。这是高尔基对“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尽管，资产阶级派遣了不少“聪明”的知识分子、人道主义者来宣传“爱邻人”、“爱人类”、“各阶级的和平合作”、“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諧”，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这一切都没有使资产阶级获得‘各阶级的和平合作’和它所希望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諧’”^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他们长期的經驗中明白对资产阶级讲“和平”、“合作”、“和諧”，就是安于奴隶的地位，对资产阶级放棄斗争，就意味着投降。所以他们坚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真理。而作为一个革命作家，如果没有这样的阶级观点，就不可能发掘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本质，也就不可能发掘出社会的真实。

有一些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断地宣传文学有所謂“永恒的主题”，如爱、死之类，似乎这些主题不是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产生，而是脱离社会生活、脱离社会的发展而

独立的。高尔基指出：所謂“永恒的主题”实际上只是“建筑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的产物，只是由于在“剧烈的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某些“个人”有“悲剧性的孤独軟弱的感觉”，他们“习惯于这种可诅咒的侮辱性的生活”，每个人“只关心自己”，而不看社会。他认为：“万物是在变化着的”，“‘月光下没有永恒的东西’，如同在阳光下一样”，而在无产阶级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文学的‘永恒的’主题，一部分正在衰亡、消逝，另一部分正在改变它们原来的意义。”^②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作家只有坚定地运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从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之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真实，什么是虛假的“真实”；因而，才能从现实生活中发掘出它的每一个斗争、每一种发展的意义。而文学的主题正是作家从实际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之中发掘出来的。那么，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的主题将从何而来呢？

总之，在高尔基的心目中，文学上脱离阶级关系而独立的抽象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因而，超时代、超阶级的文学主题是不存在的；超时代、超阶级的文学自然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正是永远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高尔基的革命传统和战斗精神。

①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論文选》，第265頁。

② 《和青年作家談話》。《文学論文选》，第296—299頁。



我国社会主义统一的国内市场

管大同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这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决定的。

市场是个历史范畴。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使人们各自的生产物转化为商品，商品的交换形成市场。列宁说：“‘市场’这一概念和社会分工……这一概念是完全分不开的。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①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在地方范围内是统一的，但是，从全社会来说，它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是处于分割的、孤立的状态。资本主义发展了生产的社会性和劳动的专业化，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消除了市场的封建割据状态，把“市场联结起来，把它们结合成大的民族市场，以后又结合成世界市场”^②。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成了社会的行为，而交换以及产品的占有，仍旧是个人的行为，各别的私人的行为”^③，这就必然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市场交换中的无止境的竞争。

社会主义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把社会生产组织成为统一的国民经济整体。社会主义的基本经

济规律，要求整个社会经济服从于统一的目的，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服务。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它要求生产和交换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否则，国民经济就不可能顺利地发展。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④，“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⑤。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指出，社会的再生产是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流通过程是生产过程的继续，流通形式决定于生产方式，同时，它又对生产发生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经济，不仅要求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且也要求生产和流通、积累和消费之间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生产，实

- ① 《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83页。
- ②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342页。
-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9页。
- ④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78页。
- ⑤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78页。



行着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产品中的一部分生产资料，是通过内部调拨进行交换的，但是，社会产品中的全部消费资料和小部分生产资料，是通过市场进入生产的消费领域和个人的消费领域的。社会主义集中统一的经济，必然要求市场有高度的统一性和计划性。只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统一的国内市场，社会主义商业才能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促进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发 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并且同资本主义的残余和影响、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为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

首先，市场的交换关系，从根本上说来，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是私人占有的，它虽然要求市场扩大，但是，扩大的结果，只是加剧市场的矛盾和斗争。恩格斯说：“斗争已经不仅发生于个别的地方的生产者之间；地方的斗争本身也发展到了民族斗争的规模，发展成为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最后，大工业以及世界市场的产生，使斗争普遍化，同时使它具有空前未有的剧烈性。”^①这种市场斗争，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对抗性矛盾的反映。社会主义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结合起来，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市场的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使社会主义国内市场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市场。

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统一的国内市场正是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这两种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也会从市场上反映出来。但是，这两种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只是公有化程度有所不同，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不断地得到调整 and 解决。这两种所有制的生产都是在国家的统一计划指导之下进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农业需要通过计划流通相互交换产品，才能进行再生产，而且不能不以商品形式来进行这种交换。这种商品交换，也正是社会主义统一的国内市场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国家正是通过这种交换来巩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加强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经济联盟。

其次，市场反映着社会分工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分工的发展由盲目的市场自发力量所支配，各生产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相互排挤和对立，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在农业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反映在市场上和价格上的矛盾也愈益尖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通过计划来组织国民经济，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生产部门之间、经济单位之间实行有计划的劳动分工。社会主义国内市场是为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的，它是联系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桥梁，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桥梁。这个市场在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统一的计划指导之下，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商

^① 《反杜林论》，第286页。



品流通，使城市和乡村、各个地区、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经济单位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得到协调，成为相互支援、密切协作的一个整体，以保证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密切协作和按比例发展。

再次，市场反映着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资本主义一方面使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减到最低水平，市场不能销售生产过剩的商品，爆发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市场上的交换关系遭到破坏。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它通常是生产一时赶不上需要的矛盾，反映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的矛盾。当人们认识到这种矛盾以后，可以经过不断的调整而逐步地加以解决，从而使市场更好地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逐步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国内市场的统一。

二

解放以前，我国的市场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市场。它操纵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手中，处于半割据状态，城乡对立，交流阻滞，投机盛行。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市场上的势力，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投机势力的斗争，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全国商业网，建

立了广泛的城乡经济联系。这时候，我国国内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一个是由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所形成的有组织的市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一个是由资本主义商业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所形成的无组织的市场，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市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是对立的，又是联系在一起。国家根据统一的财政经济政策，运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力量，对无组织的市场加强领导、管理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既然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存在，它就会经常干扰有计划的商品流通。因此，在国内市场上，进行着尖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公布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的总路线，采取逐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到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基本消灭，个体经济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样，在我国，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统一的国内市场。

在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是由三条商品流通渠道组成的。即：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

这三条商品流通渠道的存在，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水平决定的。流通是生产的继续，流通形式必须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相适应。在我国，不仅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工业，而且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农业和手工业。同这种情况相适应，需要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商业。同时，在农村经济还是集体所有



制，在农村还保存着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情况下，集市贸易也就有存在的必要。

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主体和领导力量，它按照国家的政策和统一的计划，领导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它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国家委托的购销业务，完成国家规定的购销计划，同时，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积极地、适当地和灵活地开展供销合作社的自营业务，并领导农村集市贸易。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都是社会主义商业，它们的购销活动，组成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集市贸易主要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交换形式，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集市贸易有两重性：一方面有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冲击计划市场、滋长投机倒把的消极作用。因此，要通过有力的经济措施、正确的行政管理和广泛的政治教育，利用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

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的市场既然还包括集市贸易，就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这里，应当看到，我国的集市贸易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市场是不同的。它的范围受国家的控制，市场上的购销活动受国家的领导和管理。一切投机倒把、转手贩卖、居间剥削、自由玩弄价格、牟取暴利等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活动，受到严格的禁止和打击。这种集市贸易是适应我国农村经济的需要，为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在我国，计划经济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

统治地位，但是，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还需要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有一个计划外的补充，才能更好地适应生产和人民生活多种多样的需要。

我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国营商业经营的。我国社会主义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对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只有国内市场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计划性，我们才能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组织商品的进口和出口，开展内外交流，平衡内销和外销，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国的国内市场是统一的，但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不作为一种经济成分存在了，但是，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分子，还存在着其他剥削阶级分子，他们还正在被改造的过程中。此外，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市场上来。特别是在集市贸易和自由价格还存在的条件下，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必然会在一切有机可乘的场合下滋长，冲击计划市场和计划价格。同时，资产阶级的影响也会浸入到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来。因此，必须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地运用经济力量和行政力量，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同市场上的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同一切贪污盗窃分子和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作斗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内市场的统一。



三

我国国内市场的统一，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方针政策的统一。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的统一的方针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内市场统一的根本条件。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①这也是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全国的商业工作，必须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工农业产品的收购和分配、财政和信贷、市场和物价等方面的统一政策，正确地组织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巩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

所谓统一，不是说没有矛盾，而是指在正确的方针政策下，矛盾不断地得到调整 and 解决。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各阶层人民的思想觉悟水平也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之间、全局与局部之间的矛盾，就会在市场上反映出来。只有正确地妥善地处理这些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达到真正的统一。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就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同志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②中央的方针政策，兼顾了中央和地方，兼顾了全国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及国家、集体和个

人的利益，照顾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因而，它体现了高度的统一性。同时，在物资、商品和物价等方面的管理上，实行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的制度，把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在经济工作中正确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样，就可以发挥各方面的积极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

第二，是计划的统一。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求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也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分配和交换。国家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是社会主义国内市场统一的重要保证。

在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的矛盾不是由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自发地调节的，它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来调节的。国家计划建立在全面综合平衡的基础之上。商品流通计划不能脱离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它只有在正确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中，在国民收入正确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中，才能顺利地实现。国家统一的综合平衡计划，必须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筹兼顾，适当分配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全国的各个地区。在制定和执行计划时，又必须瞻前顾后，既照顾今天，又要注意明天，既照顾当前需要，又要注意长远利益；把重点和一般结合起来，既抓住重点，又要照顾一

①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93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般，考虑相应的各个方面；既看到有利条件，又要看到薄弱环节，估计到可能发生的问题，避免片面性。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愈完善，就愈有利于商品流通计划的顺利实现，愈有利于加强国内市场的计划性，愈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的统一性。

第三，是物资调度和商品分配的统一。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由社会主义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统一供应。全国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主要产品，由国家的物资管理部门统一调拨和由商业部门统一收购、统一供应。各类商品都按系统经营，由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把社会产品有计划地用于生产和人民的需要。

在物资调度和商品分配中，同样要从六亿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例如，在农产品的收购中，既要照顾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面利益，保证城市和工业的正常需要，又要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和需要，留有余地。在手工业产品的收购中，既要保证国家对重要产品的计划收购，又要允许一部分次要产品的自产自销。在农产品的供应上，要使经济作物区得到必要的粮食，在原料的分配上，要照顾工业先进地区和先进企业的需要。在工业品的供应上，要保证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适合农民需要的生活资料要优先供应农村。此外，在商品分配上还要照顾到少数民族、华侨和侨眷等特殊需要。也就是说，在商品的供应上，使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要求，能得到适当的安排，协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合理地解决矛盾，使社会主义国内市场达到高度的统一。

第四，是货币和物价管理的统一。全国的货币投放，由国家统一规划，国家通过计划，来调节市场的货币流通量。国家物资的调拨价格、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都由国家统一规定，并且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统一的合理的调整，任何企业不能随意改变国家规定的价格。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危机和价格波动经常破坏着市场的稳定。社会主义消灭了货币资本的私人垄断，从而使有计划的货币投放成为可能。按照国家统一计划来调节货币流通量，就有利于稳定市场价格和协调供求关系。这是保证市场统一的重要条件。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工业品同农产品按照等价原则进行交换，对促进农业生产和巩固工农联盟具有重要意义。各种农产品的价格应当根据各自的价值，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使农民愿意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和双方有利的条件，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国营企业的工业品的价格应当大体接近于它们的价值，才能使各个企业正确地进行经济核算。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有计划地规定各种产品的价格，既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积累，又有利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因此，统一价格政策和价格管理，也就是以价值为基础，来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交换关系。

统一货币管理和价格管理，可以使货币投放和市场商品供应量相适应，可以使供求关系得到协调，可以使城市和乡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批发和零售之间，保持合理的差价，保持物价的稳定。统一货币管理和价



格管理，也是同市場投机势力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建国以来，我們运用这一手段，在打击投机倒把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此外，劳动力調配和工資制度同市場也有密切的联系。我們必須对劳动力統一管理，在城市和乡村之間、生产領域和非生产領域之間、生产各部門之間作有計劃的安排，合理利用劳动資源。同时，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則，統一工資制度和奖励制度，掌握工資水平和工資总額，使工資水平和物价水平相适应，使工資总額和商品供应量相适应。这样，才能保障和逐步改善职工生活，保证市場物价的稳定。因而，劳动力和工資的統一管理，也是組織社会主义的統一国内市場不可缺少的条件。

为要实现真正的統一，必須在集中統一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部門的、各經濟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方面，要有全国的統一計劃和全国的平衡；另一方面，又要有地方适当的灵活性，和承认地方一定的差异性。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統一的国内市場，进一步促进国民經濟的发展。

四

統一的国内市場不能片面地以行政区划加以分割，应当按照合理的經濟联系，組織全国的商品流通。这对促进商品流轉，节省流通費用，加强城乡之間、地区之間的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各类商品的流通，在地区上构成一定的經濟联系。这种經濟联系的形成，有自然地理的因素，有社会經濟的因素，与行政区划

不完全一致。許多商品的流通，还要受生产水平和消費水平的制約。例如，有些日用工业品，某些地区原来可以自己生产，但是，因生产水平所限，有的品种不足，有的质量較差，所以，仍然需要向工业比較先进的地区进货。

要有計劃地組織商品流通，必須很好地研究傳統的經濟联系。过去的經濟联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由于帝国主义的商品傾銷和市場壟断，由于封建势力的割据，由于資本主义的盲目竞争，有許多是不合理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大多被摒棄了。在社会主义經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經濟联系。但是，由于近年来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由于城乡关系和其他經濟条件的变化，也有一些变成不合理或不尽合理了。对于这些，应当根据当前經濟条件逐步地加以改变或調整，建立新的适应当前需要的购销关系。

不过，如前所述，合理的經濟联系，大多以一定的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和生产水平、消費水平等条件为依据。这些客观条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随着經濟制度的变革而立即改变，它与行政区划的改变是两回事情。在仍然适应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度內，它是合理的，或基本上是合理的。例如，有些城市，有一定的生产水平，也生产不少的日用品，但是，多銷往較小的县鎮，本市消費水平較高，它所需的日用品反而多向先进的工业城市进货。这种情况，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仍然应当认为是合理的。否則，不仅在商品銷售上不能与居民的消費水平相适应，还会在生产方面，出現有些地方生产



力閑置，有些地方浪費原料、材料和勞動力的不合理現象。又如，以耕牛的流轉為例，過去江南有所謂“生在江西，養在浙江，用在江蘇，死在上海”之說。江西多山區，小牛放牧至二、三歲運銷浙江；浙江多水稻，耗力重，一般用到八歲賣給江蘇；江蘇土質較松，田間勞動力較多，這種牛仍可用三、四年，再賣給上海宰殺食用。這是適合這些地區的自然條件的，因而，這種流轉也仍然是合理的。

合理的經濟聯系，大多也是合乎商業企業的經濟核算的。許多商品流轉的路線，是經過長期的實踐所形成的。任意改變，就會造成增多中間流轉環節、擴大流通費用、增加商品損耗以及出現相向運輸、迂迴運輸等損失和浪費。

合理的經濟聯系，一般是體現地區與地區之間等價交換關係的。但是，這不是說，每一筆交易都同時有等價的商品與之交換，往往有的季節出多進少，有的季節又進多出少，有時是甲地供應乙地，乙地以別種商品供應丙地，丙地又以另一些商品供應甲地。大城市與各省區之間的商品關係，這種情況更多一些。這體現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支援的廣泛聯系，也正是社會主義統一的國內市場所要求的。當然，在某些時候也可能會出現不平衡的情況，這就需要商業部門有計劃地組織交流，積極地加以平衡。但是，如果片面地、機械地強調本地區進出平衡，把商品流通變成了以物易物，這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商品流通原則的。

要合理地組織商品流通，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的批發機構的設置，要服從商品流

轉的合理需要，不應受行政區劃的限制。批發的範圍，必須按照商品的合理流向劃定，不受省界、市界、縣界的限制。國營商業的批發機構要設立在地區的經濟中心，確定其供應範圍，使基層批發商店和基層供銷合作社能按照計劃，選擇與它有密切聯系的地點進貨。基層供銷合作社，一般可按集鎮設置。這樣，就便利以集鎮為中心形成的零售商業網進貨。有些地方，也可以按人民公社設置。總之，應當允許跨縣、跨專區、跨省的合理供應辦法，以加速商品流轉，減少中間環節，減少商品損耗，降低流通費用，克服人為的障礙。

在國營商業的批發企業之間，在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之間，在批發企業和零售企業之間，還應當實行計劃分配商品和選購商品相結合的制度。基層國營商店和基層供銷合作社，可以按照商業計劃，直接向生產單位進貨。這樣，就有利於商品流通適應市場的需要，充分利用傳統的經濟聯系，加速商品流轉，減少積壓。

對一些小手工業品，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還可以繼續實行各地區之間直接採辦的辦法，實行“廠店掛鈎”，以及在某些大中城市設立傳統的小手工業品的批發市場，基層商店可以直接向這些批發市場進貨，以減少中間流轉環節。應該積極地發展城市同鄉村之間、地區同地區之間合理的經濟聯系，反對城市同鄉村之間、地區同地區之間不合理的分割市場的現象。有計劃有領導地開各種形式的物資交流會，也可以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溝通情況，加強聯系，組織協作，並且可以使一些計劃外的商品，通過購銷合同，實行有計劃的交流，避免市場的盲目性。



一个很好的革命传统

陈展超

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做什么工作，就去做什么工作，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革命事业，这是每一个革命者对工作的基本态度。

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有时做这个工作，有时做那个工作；有时在领导机关工作，有时到基层单位工作；有时担任比较负责的职务，有时做一般的工作；有时脱离生产岗位，担任干部，有时又回到生产岗位中去，从事生产劳动；有时做比较熟悉的工作，有时担负完全生疏的工作；有时在熟悉的地区工作，有时在生疏的地区工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

对于革命者来说，干这干那，上来下去，是常有的事。革命老前辈说得好，这乃是“家常便饭”。这句话，看起来普普通通，实际上，却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以党的、人民的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体现了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革命传统。

随着革命的发展，党在不同时期提出不同的任务，确定不同的主攻方向，并且从组织上采取措施，对干部进行全面的、有计划的安排。我们每一个干部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必须从全局出发，积极响应党的号

召，服从调动。

在这方面，革命老前辈树立了榜样。党和人民需要他们干什么工作，他们就尽最大力量把党和人民委托的工作做好，不怕困难，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搞武装斗争。那时候，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原来是种庄稼的农民，或者是开动机器的工人，或者是刚离开学校大门的革命青年，或者是从事社会活动的革命知识分子。总之，他们都不是武科出身，缺乏军事知识，没有打仗经验。但是，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他们在党的号召下，从头学起，积极投身到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去，拿起枪杆子，打击敌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许多同志久经锻炼，久经考验，从完全不懂得怎样打仗，而成为精通军事艺术的高明的指挥员。革命胜利以后，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党的中心任务。我们党有不少军事干部，又踏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岗位。他们有打仗的经验，但是，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这就是严重的困难。然而，他们仍然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前去迎接困难的任務，经过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终于由外行变成了内行，掌握了经济建设和科学文

101



化建設的本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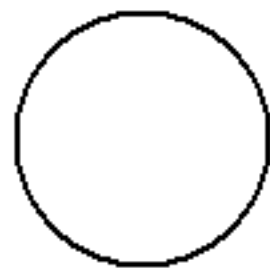
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革命老前輩不仅能够干这干那，而且也能够上来下去。例如，在抗日戰爭时期，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壮大革命队伍，扩大抗日根据地，許多同志离开原来担任的負責工作崗位，率領一小部分武装，插到敌后去发动群众，組織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又例如，在土地改革中，許多在上层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下到基层单位，做具体工作。他們下去以后，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同样地表现了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誠的高貴品质。

革命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員，他的义务是为人民办事。因此，他能够干这干那，能够上来下去。这是旧社会的統治阶级所绝对办不到的。旧社会的統治阶级和人民处于对立的地位，根本不可能为人民办事。尽管他們以“人民的公僕”自夸，但是，怎么也掩藏不住他們的一心为了个人升官发财的真正目的。就“上”“下”來說，他們认为这是攸关个人升官发财、荣辱得失的大問題。在他們的眼里，“上”，是个人的高升、走运，“下”，则是个人的下降、倒霉。因此，他們只能“上”，而不能“下”；只能“大”，而不能“小”。这是他們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作为人民勤务員的共产党人、革命者，必須随时警惕、清除剝削阶级的等級地位观念的影响，按照党和人民的需要，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革命和建設事业，有許多战线，許多行

业。在每一条战线、每一个行业中，又有不同的工作崗位，工作范围有大有小，責任有輕有重。但是，各种工作都是革命工作。在革命队伍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新的同志关系，大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員。这里沒有貴賤之分，尊卑之別。無論在哪一条战线，哪一个行业，担任什么职务，做什么工作，都是革命的一种分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具体表现。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同志在接見全国群英会代表的时候，曾經和群英会代表、北京市清洁工人时傳祥这样說过：“我們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員，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員。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革命分工也就是革命的需要。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同志，都必须正确地看待和处理自己同革命的关系。一方面，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干这干那，上来下去，特别是下到基层去，到革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另一方面，当革命需要自己在一个时期內相对地稳定在一个崗位上的时候，又能够安下心来，尽最大的努力把 work 做好。而不論哪一种情况，每一个革命干部，都应当无条件地服从革命的分工和需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专一行。

革命者，由于各人的实际情况不同，工作能力有大有小，但是，只要具备了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精神，就能夠在不同的崗位上为革命做出自己的一分貢獻。能力大的同志，



固然可以負起工作範圍較大、責任較重的領導職務，作出較大的貢獻；而能力小的同志，也可以做好各種具體工作，作出較小的貢獻。貢獻雖然有大有小，但總是一分貢獻，對革命都是有利的。劉少奇同志說：“我們，普通的黨員，在共產主義事業中也是做一部分工作，盡一部分責任。我們的這一部分，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那一部分，當然是小得多。然而，我們總有一部分。大小雖然不同，但都是整個偉大事業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只要做好了一部分工作，就算盡了我們的責任。我們當然要儘可能使自己做的工作多一點，然而，如果不能多，就少一點，也是有益的，也是一樣光榮的。”^①

革命者不僅要不斷地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覺悟，而且還有責任努力提高工作能力，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革命實踐是一所偉大的學校。一個革命者，在這所偉大的學校里，自覺地經受鍛煉，既可以提高思想覺悟，又可以增長工作才能。列寧說得好：“歷史早已證明，偉大的革命鬥爭會造就偉大人物，使過去不可能發揮的天才發揮出來。”^②對於革命者來說，任何一種革命實踐，都是鍛煉自己，提高自己的好機會。革命者在上來下去、干這干那的過程中，能夠獲得各方面的經驗和知識，鍛煉得更老練、更成熟，從而能夠更好地處理各種問題。

一般地說，在上層領導機關工作，需要經常注意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和典型試

驗，在基層工作需要認真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學習時事，關心全局。但是，就干部的鍛煉來說，在上層機關工作，主要是在學會如何通觀全局，如何做好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方面，得到較多的鍛煉；在基層單位工作，主要是在具體實際工作方面，得到較多的鍛煉。對於每一個干部來說，基層工作的鍛煉可以說是一個基本訓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個人都應當從一個普通戰士做起，都必須自覺自願地加入到戰士的行列中去，向工人學習。^③初參加革命的同志，缺乏實際工作經驗，階級鬥爭知識較少，政治修養較差，組織上就有意識地讓他到群眾的革命鬥爭中去經受鍛煉、考驗。有些同志長久在上層機關工作，參加群眾實際鬥爭的機會少了，又需要下到基層單位去，從群眾的革命鬥爭中吸取新的養料。

我們黨的大批干部，就是在革命實踐鬥爭中，在群眾運動中，鍛煉出來的。他們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既能文又能武，忠心耿耿地為革命而工作。實踐證明，讓干部干這干那，上來下去，經受各種鍛煉，邊干邊學，在實踐中增長才幹，這是

①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修訂2版，第54頁。

② 《悼念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1頁。

③ 參看《恩格斯傳》，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219頁。



培养干部的一种好制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我们必须发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不脱离实际，不脱离基层，也就是不脱离群众；只要条件许可，就要到基层去经受锻炼。下去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时候一杆子插到底，直接到车间，或者生产队；有的时候是由省到县，或者由县到公社；有的下去担任实职，有的则以工作组的名义下去帮助工作；下去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

期的。

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不断地发展，党对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适应这种情况，每一个革命干部，应当学习革命老前辈的榜样，发扬他们的既能干这干那，又能上来下去的优良传统，努力在实践中自觉地加强锻炼和修养。只有这样，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兴旺发达，而每一个同志也就会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得到锻炼和提高。

正确地对待考据

杨永志

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占有丰富的、经过严格审订的材料。对于古典文学、哲学史和历史科学的研究，也是这样。这些科学研究需要依据历史文献。为了作出科学的判断，需要对历史文献进行审订：辨别文献真伪，校勘文字正误，注疏文字含义，诠释典章制度，考辨人物身世等等。这些辨伪、校勘、训诂，是古典文学、哲学史和历史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工作。过去和现在，勤恳地、认真地从事考据的学者们，在校勘、训诂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在科学研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如果把考据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摆得不恰当，片面地夸大它的作用，无目的

地进行各种考据工作，却会给科学研究工作带来害处。以古典文学的研究来说，就有人忽略了对主要的关键性的问题的探讨，而进行了烦琐的、无意义的考证。对宋玉笔下的虚构人物登徒子的考证可以作为一例。考据者根据史书上曾有过关于孟尝君和登徒直的一段故事的记载，断言“登徒子或许可能是登徒直的下一代，或是同姓的后一辈”。考证登徒子是不是“登徒直的下一代”，对于研究《登徒子好色赋》这篇作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鲁迅就曾反对过把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当作历史真实人物来考证。他在《阿Q正传》序中指出：企图考证阿Q的姓名、家谱和籍贯，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历史癖与考据癖”



的人才才会做这种考证。^①

考据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环节，一种手段。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订、注疏等工作，都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

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的时候，搜集了历代的小說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了认真的考据。但是他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仔细地考证了《水浒传》的一百十五回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和續水浒传等各种版本。他指出，續水浒传两种版本“立意正相反”：一是清初“遺民未忘旧君，遂渐念草澤英雄之为明宣力者，故陈忱作《后水浒传》，则使李俊去国而王于暹罗”；另一是“康熙至乾隆百三十余年，威力广被，人民懾服，即士人亦无貳心，故道光时俞万春作《结水浒传》，则使一百八人无一幸免”^②。鲁迅通过版本的考据，向讀者說明各种版本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

恩格斯在《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語言》中，詳尽地对法兰克語言进行了考证。他考证法兰克語言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研究日耳曼部落的历史。他說：“在关于法兰克方言所进行的研究中，我們将要证明，法兰克人是分裂为許多不同部落的日耳曼人的特殊集团”^③。他所以有选择地、集中地考证法兰克語言，就是因为法兰克人的发展，对研究德国古代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恩格斯在对語言进行考据的同时，又考察了法兰克王国统治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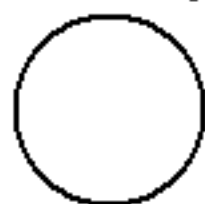
土地占有关系，阶级关系，以及地方行政和軍事制度等上层建筑。《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語言》这本书，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史的典范，而不是像有人說的它“完全是一部考据书”。恩格斯在《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語言》一书中作出了重大的理論贡献，他闡明了德国古代的历史过程及其規律性，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单是考据，那就绝对不可能作出这种贡献。从恩格斯这本书中，可以清楚看到考据只是他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从这本书中可以学到考据与理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学到考据为理論研究服务的方法。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規律性。考据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在馬克思主义观点的指导下，掌握大量的资料，并对它进行理論概括。把考据当作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并不是降低它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恰如其分地估計了它的地位和作用。因为被审訂的那些材料，只是反映事物的各个侧面，而科学研究则要“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

① 参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2—75頁。

② 《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237頁。

③ 《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語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頁。



概念和理論的系統”^①。也就是說，必須通過理論思維和邏輯分析，才能透過事物的現象揭示它的本質和規律性。考據可以為達到這個目的提供條件，但只是考據卻達不到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性的目的。作為一種手段，考據絕不能代替科學抽象和理論分析；而且比較起來，它只是一種次要的手段。正是因為這樣，古典文學、哲學史和歷史科學的研究工作就不能停留在考據上面。

在我們的古典文學、哲學史和歷史科學的研究隊伍中，有少數人專門從事考據，或側重考據，給考據工作以一定的地位是應該的、必要的；但是不能過分夸大考據的作用，不應該輕視理論研究。認為只有考據才是“實學”，過分夸大考據的作用，或者把考據看作目的，為考據而考據，實質上是一種資產階級學術觀點，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清代漢學家學風的影響。

清代漢學家的考據工作有一定的成績，在考據方法上也有若干可取之處。但是，漢學家大都脫離當時的社會實際，一生在故紙堆里扒疏，並且認為只有這樣的考據才是實在的學問，而探討義理則是空疏。因此，他們不能從社會實際或歷史實際出發作理論的概括，很少作出理論上的貢獻。而且，就在考據方法上他們也有很大的缺點，煩瑣便是一個突出的表現。我們對漢學家的學風和治學方法，應該批判地對待。

有人過分地推崇清代漢學家的學風和治學方法，仿佛漢學家的學風和治學方法是我們

應該無批判地仿效的。這是不對的。這種看法只能給科學研究工作帶來害處，它可能把科學研究工作局限於考據的狹窄範圍之內；同時，也會給考據工作帶來害處，它可能使人重復清代漢學家煩瑣考據的錯誤。我們的历史學家、古典文學理論家和哲學史家當然不能做漢學家，而應該在更廣闊的天地里，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展開研究工作。我們的學風，應該是毛澤東同志經常教導我們的理論和實際相聯系的學風。就是考據工作者也應該批判地對待清代漢學家的考據方法，避免煩瑣的舍本逐末的毛病，尽可能地提高考據工作的水平。對待清代漢學家的遺產，正如對待其他歷史遺產一樣，我們應該遵循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②。只有經過批判的總結，才能正確地繼承這份遺產。

我們要大力提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際相聯系的學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進行研究工作，既反對排斥資料的空談義理，又反對輕視觀點的煩瑣考據，而主張把義理和考據、觀點和資料正確地結合起來；既反對抹煞考據的作用，又反對夸大它的作用，而主張給它以適當的地位。這樣，考據才能夠為探討客觀規律的理論研究服務，才有利於科學研究的開展。

①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80頁。

②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頁。

